

张承志 选编



彼岸的浪漫

我最喜爱的浪漫小说

梅里美
托尔斯泰
艾特玛托夫
塞万提斯
鲁迅
冯梦龙



新世界出版社

张承志 选编



彼岸的浪漫

我最喜爱的浪漫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的浪漫:我最喜爱的浪漫小说/张承志选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3.5

ISBN 7-80187-033-6

I. 彼… II. 张…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630 号

彼岸的浪漫——我最喜爱的浪漫小说

策划:钟振奋 王方红

编者:张承志

责任编辑:晓 钟

封面设计:席恒青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32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 86(10)6899 6306

印刷: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20 千字 印张:11.125

印数:1-6000 册

版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033-6/I·008

定价:21.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彼岸的浪漫

张承志

年前曾在东京的橱窗里看到一本文化批评期刊。封面上有一个一语中的又极度戏谑的通栏标题：“献给濒死的当代文学的最后的心脏按摩”。望着它只觉又开心又惊奇，于是就记住了它。

后来多次觉得，这句戏言也可以馈赠给我们亲爱的文学界——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使这世界没人看、更没人喜欢小说的伟业。确实，如今的多数小说，不消说也包括空洞的散文乏情的诗——已经不能感动任何正常的人。

尤其是那些火鸡露屁股般炫耀技巧的作品（那是人们早在八十年代就玩剩下的）招人哈欠——我打听过不少读书者，大多都是翻个一页半张就随手扔开了。大都是，开头已猜测到作者小小的伎俩；读完更发现了作者空空的瓢芯——真实比预感更可悲。

我也一样。出于职业的需要，虽然我常告诫自己：一定要对同行秀作大体了解、要定期地抽点时间阅读、要注意作家最要命的病是自闭症和自恋狂、你这种一读就困的毛病是危险的——但是，阅读的条件之一，是作品的吸引力，以及必要的感动。而它们没有如此资质，如无磁的塑料制品。我着实读之不进，也实在无法喜欢。

渐渐地，我不再尝试对它们愚公移山。原因很简单，我自知并不是在蔑视小说艺术。不仅确实存在我喜爱的小说，而且存在着相当深地镂刻于我心的小说。它们不仅曾经给我启发，而且还永远地对我启发滋养。为了读懂那样的小说，我已经不止一次背着行李省下饭钱，一步步踏寻它的场景；或者费了大劲学习外文，以求咀嚼原文体会本意。

——这就是我答应编选本书的一个原因。

1

一个初遇的作家是前苏联的艾依特玛托夫。不知今天的民族主义风潮是否使他打算取消姓氏中的 Ov，恢复突厥式的艾依特玛特。

前苏联作家对中国的文化输出，真算达到了极致。政治的严峻前提，至少使中国人极细致地研读了他们。我读苏联作品读得少，但认真读了艾氏从一个天山牧民的代言人到藉民族为标签的官僚的很多作品。停止于他的长篇《断头台》，一部庸俗的败笔；开始于他的《江米拉》（查密莉雅）——令人类自豪的美文。

那些对天山腹地高山牧场及其住民的抒情，换了谁都可能写坏，而艾依特玛托夫写得淋漓尽致而不失分寸。我因为有多年在东部天山调查的体会，因此对他的西部天山描写目瞪口呆。

在中国他的理解者，是有双语的哈萨克和柯尔克孜小伙子们。1982年（或是1984年），我曾在新疆和一个这样的柯尔克孜小伙子邂逅，记得在乌鲁木齐文联附近的一个小饭馆，我们俩居然谈着艾依特玛托夫一个话题，从傍晚直到深夜。

我们逐字地讨论着艾氏的用语，把音译或意译的汉译还原为突厥形式。那天的小馆人影稀疏，只有我俩对坐着，时而滔滔不绝，时而为一些无法译出的美感，叹息不已。乌珠穆沁的知识有力地支撑了我，否则我根本不是这突厥小专家的谈话对手。关于小说《骆驼眼》的话题是我提起的，因为我藏有蒙语所谓 botag（一岁驼）的容貌。他为我确认了那是固有语词 bota köz，一岁驼羔的眼睛。此词意为美丽的眼睛——蒙古牧人一听便啧啧声羨，因为他们熟悉驼羔的美目。哈萨克人则自豪，因为是他们完成了从驼羔眼瞳到观念中美目的抽象。

若想体会到文学的这一层，需要地道的而不是教授圈所云的“文化”。面对力透游牧本质的文学，需要深刻的牧人体验才能理解。所谓才华恰在这里，他不仅写了而且写到了极致。这一切，对哈、柯朋友讲半句就彼此意会了，而对修养不足的汉语文学界，讲述是困难的。

当然还不仅仅是这种草地掌故。艾依特玛托夫主要依仗的是有底气的抒情。那些大段大段的描写、随意搀杂滴洒着马经草经的妙笔——真是太美了。那享受无法忘怀，读一遍像是洗了一场美的沐浴。他凭仗的是神奇天山的灵气，所以他拥有无敌的艺术。回忆起来，若是没有读过他，可能人生不至于因之残缺，但是那将太可惜了，没有那样读过简直不算读书、没有那种在阅读中被美好感觉浸泡的经历的人，简直太不幸了！

在70年代初的内部书《白轮船》里，他已在顶点。他写到了死，那个敏感的柯尔克孜男孩无法接受世相，在激流和憧憬中淹没了。

以后他的分量在减轻。《花狗岩》这个词组不再具备那种突厥式的情绪和寓意。《别了，古丽萨雷》的马名（花黄马），大概不一定会使牧民喜欢——当然不仅题目，小说像在奏篇

幅。对于一个巨大而深奥的领域——游牧的中亚突厥民族的伊斯兰教及其穆斯林生活方式，他没能突破桎梏，无一字触及。最后是一本败笔，时空倒错、环境保护的《断头台》。全苏作家领导人、还有国际名人的高位，使他异化并退出历史。

用不着感叹。他已经足够幸福，他的母族柯尔克孜已经足够自豪。他已是天山之王，很难想象更好的天山作品。

他小说的文笔其实是旧式的。他急着要表达的那种浪漫，其实只是一种游牧民族的心情。他成功于此，因此而不朽。我本人特别向他学习了一些修辞知识，以及模糊的“游牧民族的心情”。

2

记得那时，有一次几个北京作家和一个美国作家见面。说到海明威时，他吞吞吐吐左旋右绕。我发现外国人对海，并没有像我们那样推崇。如今我不再觉得奇怪了。海明威并没有“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倒是80年代整整一批作家都人云亦云地言必称海，就像这些年又在言必称略萨或《追忆似水年华》、必称《哈利·波特》和《国家地理》一样。

当企求表达、机智地晓得了要经过形式，当作家意识到要“变”一家伙才成的时候，海明威和他的句号排列的电报语言，他的硬派写法，给人提供了最对写家胃口的资料。虽然也有眼光更深、洞知阴柔克阳刚真理的作家（如阿城若贾平凹），但海明威的确是国产小说转向现代派的一大桥梁。

他确实是个影响作家的作家——不过比内容更多的是他那亦我亦你、亦叙述亦烟幕、亦念叨亦神经的形式。对于一部分人（包括此刻汗颜的笔者）来说，他们正渴望那种快速而易于

速成的笔法，于是海明威的“影响”成功了。

不过老海对中国的影响没有多久。老辣的中国文化，显然不是区区海明威所能驾驭的。曾几何时，连海明威作品中的正义连同那硬汉子派头，都已经暴露在中国人阴损的嘲笑之下了。

比起艾依特玛托夫，也许海明威更没有获得“永恒性”。艾依特玛托夫还会保持着更长的被欣赏和怀念的价值，而海明威则旧了。他没有成为小说的新古典，他只是旧了。因为当年只是一个新，所以后来他旧了。

语言还是新鲜、简洁、一泻而下的，但已能清楚地看见雕琢和刻意。看着作者在凭能力而不是凭打动人的内核长篇大论，我心里开始不以为然。包括《老人与海》，它不能如那种伟大作品一样面对读者。

《老人与海》不过以形式取胜。这样的小说怎样影响了人们，其过程应当很有趣。不能说它内容苍白，但也很难说有力。我猜在拉丁美洲寻找自己的别墅，是美国佬的一个风尚。住在古巴的美国文豪海明威，与古巴渔民之间有没有一种微妙的隔阂呢？

或许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已经有权说，文学或学术的潜意识中的殖民主义气味，最终会招致反感以及清算。海明威有没有传染了这个病呢？当看到他那部庸俗电影《乞力马扎罗的雪》，画面上架着帐篷的一对白种男女，使唤着黑仆、眺望着雪山并用现代派语言谈论一只死狮子——真让人恶心不已。

原来打算选上《老人与海》，毕竟在一时为我仔细研读过。但海氏版权已被我国某出版社买断，本书不能选用。

这样也好，省出篇幅选更好的。本来我就暗暗觉得那打鱼的老头，形象里哪儿有点毛病。海式语言中的电报技巧，在本

质上是做作的，经不住重读，不是大家手笔。他作品中的一股“外人味”拂之不去，而这正是文学的大忌。

3

真正值得叹服的，还是梅里美。如果你要我不是从全面而是从文学性——指出自己最佩服的作家，我选法国作家梅里美。

最近我写了自己追寻梅里美名著《嘉尔曼》场景的一篇散文（《临近的嘉尔曼》）。我说过这样的一些话：

“一忽儿我猜到了梅里美的思路，他恐怕曾经沉吟良久。他需要一位底蕴与嘉尔曼精神相当的美男子，为了给将要出场的吉卜赛美女配一个合适的伴儿。——怎样才能达到不是阅读的、而是一种如视觉如画面的匹配感觉呢？我明白了：渊博的他选择了巴斯克人。”

“小说开篇处，有一大段对古战场孟达的学究式语言。后来我才知道，那段看似随口道来的引子，是梅里美借小说一角，相当认真地（虽然口吻轻松）发表着自己的学术见解——他对孟达位置的研究。梅里美提出的甚至不仅是一家之言，他很可能是最早的一位古孟达地望的正确诠释者。”

“抑或梅里美就是在与某些语言学家抬杠？作家不满意低质地的学者的现象，在文学史上总是间或有之——孟达古战场和巴斯克民族的精湛例子，使我直觉地意识到：对这个结尾，梅里美是在有意为之，他是较真的和自信的。”

梅里美大概给了我如下的、关于“浪漫”的启示：

第一，小说之内——流畅如水的叙述。比起梅里美的白描，艾氏的强抒情加风景画如同儿科；海氏的打电报和硬汉子更是做戏。

第二，小说之外还有思想、主义、发现、学识、异调、立场。比常见到的小说多几重的内涵。小说中的知识乃至学问，不是为了显示过人一等的丰满，而是预言作者的先觉。

如今看来，《嘉尔曼》里的孟达考证不过是牛刀小试；作者对吉卜赛抑或巴斯克式的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对他们悲剧的预感才是大家的着眼之处。前者在纳粹时期（吉卜赛人是纳粹种族灭绝的对象之一，约死亡 25 万人，而且最早被使用毒气室杀害。但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们的受难无人提及），后者就在当前（巴斯克曾被佛朗哥右派军人政权剥夺了包括语言在内的民族权利。因此导致的巴斯克部分人的武装对抗，至今是西班牙的绝症）——都被逐一验证了。

第三，对爱情和性的写法高人一等。不做官能的描述，但给人以更大的空间和静态的磁力，使人难以忘怀，因此也更具魅力。我无兴趣顺便言及国产女写家的肉体写作，但因此选编了我国明代冯梦龙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它也是这个道理的一个例证。

第四，数十百年后，依然使人对故事和人物回味。这种作品，使人浮想联翩，但是难生狎念，良久余香不散，只觉绵绵慨叹。那浪漫是刻骨的，不是勾人的情节，而是内里的什么。那种浪漫，左右和指导知音读者的一生。

他笔下的小说是不朽的，他笔下的文化也是不朽的。这一

切——故事、人物、文化构成了一种美感，别人难想难及，魅力如蚀如刻。

他描画的“异族”那么光彩夺目，使得当年羊皮为服酪为浆、正值身为异族的我，一下子就被牢牢抓住了。远在艾依特玛托夫之上，是他影响了我的文学趣味和笔法，也影响我开始了类似的观察。

梅里美的异族描写含义无穷。

异族不但给了他驰骋天地和抒发学艺的可能，也使我愈来愈认识到——尊重他人的立场，即真的人道主义。

4

感动于当下的中国，看来不但已是一个多余的词，而且是一个招致围剿的、穷酸而虚伪道德的词儿。我们的新潮精英，因为他们自己本质的下流，所以对一切具有美感的东西都充满敌意。但文学虽然对他们本来就是厕所，而对更多的人而言，却仍是人生苦恼的良友。我不对当下听着刺耳的“浪漫小说”加上自家一解；但我想我划定的与厕所精英的边界，基本上是“感动”。真情的感动，经验的感动，认知的感动，大约就是它了，除此还有什么。

就文学的学术概念而言，我不知把它们归类为浪漫小说到底是否正确。但我已经提出了感动的原则。它们是我心目中的伟大的小说，它们永远地感动着我，它们是给我以人生各个阶段的关键指导的文学遗产。

这种浪漫作品，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抽象主义，不见得写异性更不见得写故事。它们未必使用抒情手法，有时金子般的真知灼见、有时一种终点般的知识，能使度尽沧桑的老者潸然

泪下。它们如春雨落地，寻找等着的草籽。一些人因它们而开始了人生。没有它们人类就不能奢谈文明。它们拥有永恒的吸引力，如地球的一个磁场。它们有力量夺取人的心。它们使人从十八九的中学生时代一直到悲叹白发的五十七十，不能忘怀时时感动，它们使人们一代代地反叛世俗，非要步吉诃德先生后尘投身逆旅，不顾惜地赔上自己可怜的生计。

出于这样的思路，此书还选入了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和鲁迅的《伤逝》以及一章《一千零一夜》。它们都不能简单概括，都是一线牵动远近，可涉及到许多话题。

尤其是托尔斯泰，更不用说这一章《一千零一夜》，它们拥有的内涵，都远远超出了区区文学的框架。我几次犹豫，终究还是无法以这样的短论，几句带过如此的话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或几个浩渺博深的大海啊。既然无力做最低限的概括，那就干脆不写一字。伟著是不死的，读者是无限的，在如此的分寸地步之上，无需我愚蠢地介入。

5

最后一段，留下我也不甚懂得、但我时时都在捉摸的堂·吉诃德，让我们大家一起猜谜。

我说不清对他的感受。但我直觉，他是我的浪漫榜上的第一人。

这里节选的是连续的两章：讲脍炙人口的大战风车故事和书之缘起的第八、九章。像《红楼梦》的第四回是“全书的纲领”（毛泽东语）一样，我想《堂·吉诃德》一书的纲领，也许藏在第九章里。

刚刚从西班牙回来，回忆起在那里与人谈及吉诃德，便觉得以前中国的介绍不得要领。没有什么对“陈旧的骑士小说”的清算和嘲讽，只有那个悲容瘦马、神经兮兮的难忘形象。

谁都忘不了他。谁都把他当作倒运的良心、正义、以及自己。以前的骑士小说早就灰飞烟灭，鬼知道它们是否存在过；若说骑士非他莫属，倒不如说——他是继承了包括骑士小说在内的传统的、人们心目中的惟一骑士。面对一切强权和不义，惟有他给予人们和弱者以一种纯粹象征性的援助和一种温暖的阿Q式的心理安慰。只能自嘲的我们的生存，证明了塞万提斯的半做自嘲半是宣言的写法，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否则谁对付得了如此恶毒的伤害。我觉得中国人会对此体会得最快，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中国的文化语境，教训得每个人都渐渐学会以嘲弄为发言方式；近代的例子，你可以看看鲁迅。

这是一个不谋胜利、奔向失败的骑士，一个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绅士-骑士道”完全相悖的骑士。当然，它也同日本的“武士道”风马牛不相及。

这是一种弱者和败者的、无力民众的、被侮辱和被压迫者的**骑士**。他取胜无期，活该倒霉，一次比一次惨，但他就是不认输。

他甲冑在身，人在鞍上，继续着给我们大伙儿表演奇异的示范。他使失败者破涕为笑了，使他们获得了满意的暗示。

对此书深意的发掘尚未开始。所以中国的几种译本，对读解这部奇书，对探讨它的一些隐喻和疑点，显得缺乏敏感。在旅行西班牙的日子里，虽然我听说了一些对本书原意的新鲜探讨，以及一些发人深省的颠覆性研究，但我不是一名适当的转述者。我只在这里对第九章提醒一句，并愿和读者一起关注对

堂·吉诃德的历史性发掘的消息。因为吉诃德先生并非与中国
人无关。或许中国思想的危机处境，更需要吉诃德精神的补
救。

或许包括本书选入的许多大师也会终随逝水，而只有伟大
的塞万提斯，只有伟大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恰和他的同伴桑
丘，才将是文学史上最终青史留名的头号伟人。

6

以前我曾多少对一些名著的部分译语吹毛求疵，还不是因
为那些瑕疵导致了译文暧昧或失误，也许我的意思是想说：并
非要去追究中译者的修养问题，而是我们该在这些地方补充自
己的修养了。都是一些零碎的发现；除了突然发现瑕疵的惊奇
之外，也有突然意识到大师蕴含时的感触——两种都使我耿耿
于怀。

比如，若把哈萨克或柯尔克孜语的“江米拉”自俄文译为
“查密莉雅”，那么作品就丧失了一层中亚韵味。**Jamila**，是一
个常见的伊斯兰经名，尤其常见于中亚游牧民族的女孩。当然
它的语源是阿拉伯语；比如五十年代曾有一部描写哈萨克牧区
的电影，题目就是《哈森与江米拉》。不用说我国译族名 **Kerk**
- **Kez** 为两个词，“柯尔克孜”和“吉尔吉斯”；后者译自俄
语，发音自然不确。

再如我写过：“译文中类似的粗糙，也流露在对付比如阿
拉伯语词的时候，如译阿不都·拉合曼为‘阿勃拉·埃尔·拉
芒’。”

阿不都·拉合曼，**Abd al - Rahman**，阿尔·安达鲁斯（**Al - andalus**，即西班牙的穆斯林时代）的科尔多瓦王国的著名国

王。傅雷自然是根据法文转译，把这个并不罕见的阿拉伯名字译成了“阿勃拉·埃尔·拉芒”。这会导致费解。虽然不能过多苛责译者，因为依据一种语言是翻译的基本；可是在涉及重要文化背景之处，查对人名、地名的原文发音再添加注释是必要的。《嘉尔曼》中译本能够指摘的粗糙，是傅译删去了最末一段关于罗马尼（即吉卜赛）的语言学例句。

《堂·吉珂德》一书中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第九章记录的，作者在托莱多的旧市场上，发现一卷阿拉伯文书稿的叙述。他请人翻译出来，书名全文是：

《堂·吉珂德·德·拉曼恰传记》，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学家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

（西班牙语原文为 *Hisoria de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escrita por Cyde Hamede Benengeli）

这个“阿拉伯历史学家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名字属于谁？是小说家的虚构么？我们无法做更多的猜测。但这几行里也许藏着《堂·吉珂德》一书的最深秘密，同时也藏着作者米格尔·塞万提斯的一个最想纪念的名字。

能说的只是：西德（多译为“熙德”）有两种含义，一是“先生，阁下”，在西班牙的中世纪，因一部《熙德之歌》使得这个词很著名。另一种可能则是“圣裔”，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在临近西班牙的摩洛哥，这个词冠于名前时多为一个称号，意为“圣裔”）。另外，对于了解安达鲁斯时代西班牙的人来说，“贝嫩赫里”之名的原文 Benengeli 中的 Ben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阿拉伯语中的“本”（即儿子）。

面对语言资料中的双语的问题，幸好有伟大的托尔斯泰做表率。读到他的时候，文学作品中的双语缺憾，变成了双语的甚至更丰富的文化养育。托尔斯泰的语言修养非一般所谓大师所能比拟，他不仅了解，而且重视被描写对象的语言问题。与其它译者的草率处理相反，托翁常常给我们传送宝贵的语言资料，应当说，是心情的资料。

《哈吉·穆拉特》里包藏着不仅阿拉伯、甚至还有突厥的语言信息。除了大量一般的伊斯兰式的问候、知识术语外，托尔斯泰的语言学记录，使我们可以感觉（虽然还不能推断）车臣民族的突厥因素。如下一组对话，与今日维吾尔语毫无二致：

Ne Habar ?	聂 哈巴尔（有什么消息？）
Habar yok.	哈巴尔 约克（没有消息。）

在一篇毫无费解、极其流畅的中篇小说中，有多处这样的例证。不用说还有大量的历史和宗教记录，尤其是穆里德制度的描写。中译的“缺憾”同样存在：虽然托翁已经苦口婆心提供了那么多资料，还是多次用“真主之外无真主”这一错误译法，顶替“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原则翻译。

译自阿拉伯语的《一千零一夜》也不例外。所引“我创造人、神，以便他们尽膜拜的天职”（《古兰经》51章56节）一句，其中“神”一语应是 al-Jin，镇尼，即精灵，和中国人讲的“鬼”很近似。另外，把常用的“唤礼”或“宣礼”（即呼唤人来礼拜）译为“招祷”，也易使人不得其解。

加了以上的选编者议论，主旨是想强调一个态度：无疑，丰富的浪漫主义从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内涵的热情既

不能支持人或民族的道路，也不能支持持久的阅读。一元中心的文化潜意识要受到不断的纠正。我们虽然只是文化的后学，但从我们这一代起，中国会有人——把求知的步伐，迈向各种文明的奥深。

书序一经作家执笔，就会发生一个毛病。作家总是自言自语，忍不住地扯及自己。我这个序也未能免俗；它们无疑只是一瓢之饮，而且串连着个人的体验。编者总是不觉把书编成了自传的背景注。署名编选的办法，自然会显示编者个人的原则、修养、偏见、品味，深刻建议的可能和低级趣味的可能各占一半。会不会已经出现了错误呢？——所以，说到头来，一切惟有仰仗读者自己的选择。

以上。

此文大致基于一篇题为《彼岸故事》的旧作，后来补写繁衍，草成滥竽，聊作塞责之序。

张承志

再改于2003年5月，地中海归来之际